

1934年《磐石杂志》“公教与爱国”专号的民族立场*

顾卫民

摘要:《磐石杂志》为1930年代初期中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份重要刊物,它由北京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支部创办,旨在介绍中西文化及宗教事业调查研究,兼及社会新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引发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爱国人士的民族感情和救亡热忱。《磐石杂志》1934年第2卷第5期“公教与爱国”专号的主要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教会中人士对“国难”的思考和认识。

关键词:《磐石杂志》;公教;爱国

中图分类号: B929;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07)02-0179-05

作者简介: 顾卫民,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上海 200234)

《磐石杂志》为1930年代初中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份比较著名且有深度和广度的刊物,它创办于1933年9月,杂志社和编辑部设在北京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支部,并且由该支部的青年天主教知识分子担任编辑者,据第一期创刊号上的杂志社章程指出该刊的宗旨及内容如下:(1)本刊定名为《磐石杂志》,每3月出版一次,以介绍中西文化,宣扬公教思想及研究宗教事业为宗旨;(2)本刊以美化人生,促进社会改造为目的,故愿本正确确实的态度,作真理及事实的研究;(3)本刊内容(A)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法律、教育、哲学、科学、文学各方面思想学说之撰作,(B)重要书籍著作之介绍与译述,(C)关于公教思想及非公教思想之论述,(D)宗教事业之研究与调查,(E)公教进行运动之记述与鼓吹,(F)演讲杂论及其他;(4)本刊附副刊一张,与季刊同时发行,该副刊专门为初级中学以下读者而设,其材料亦以适应这类读者为主。最后,该刊编辑部要求投稿者亦注重配合上述之内容,如读者有歧义者可写读者来信,在“读者来函”一栏发表,编辑部不负责任。

从编辑部上述的阐述可以看到,《磐石杂志》是一份立足于公教立场,同时注重中西文化思潮的阐发,并且兼顾与公教以外学者对话的刊物。它创办于第一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离华之后,当时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运动已经逐渐展开,尤其是本地化的思潮已经渐渐被教会内的知识分子所认同(该刊许多文章中多次提到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通谕以及刚恒毅在华的活动),公教进行会的活动也很活跃,因此,该刊的创办,应当视为20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运动中的一个成绩。

关于《磐石杂志》之释名,创刊号上发表了时年93岁的著名天主教学者马相伯的题字:“磐

收稿日期:2006-09-28

* 本文属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T0406。

石喻圣教,唯圣教能与人以真福常生,大学诸君能阐明教义真谛,则头头是道矣。九三相老人题。”

《磐石杂志》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一个突出的主题便是“公教与爱国”。本文兹就第2卷第5期“公教与爱国”专号,作一介绍。

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迅速地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1932年2月,清逊帝溥仪被日本人挟持至东北出任执政;3月1日,溥仪甘为日本傀儡,沐猴而冠,加冕为伪“满洲国”皇帝,而华北的广大地区,时时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天主教会必然面对“国难”表明自己的态度。公教人士必须向社会大众来解释作为教徒的国家观、民族观、战争观以及和平观。“公教与爱国”专号站在天主教立场,很好地向社会大众阐述了上述的观点、立场鲜明,毫不含糊,一洗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视天主教会为“洋教”或者“殖民主义先驱者”的观感。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中国天主教会人士已经对上一世纪传教历史所作的反省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

早在创刊号上,编辑部已经发表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文章,希冀引发读者对民族危机的注意。创刊号发表的是《〈满蒙问题〉译者叙》,作者为黄伦芳。该文指出:所谓“满蒙”,指辽、吉、黑、热四省之地,面积437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000余万,比日本面积大三倍,咸丰、同治以来,直鲁人民移民该地者许多,但“外力(日本与俄国)横行,喧宾夺主”,尤其日本人对满蒙的研究不遗余力,仅南满铁道会社编译者即200余种。译者提醒大家,《满蒙问题》虽然是日本人的著作,但从中可以看到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动机,“且彼对我国之谋划,用力之勤用心之细”,从而引发国人的警觉^①。尤为令人讶异的是,在这篇文章的下方,刊登了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的一段话曰:

中国的民族,并不是天然的姿稟上,不及西方民族;并不是天然的姿稟上,没有创造文明的能力。因为地理的关系,以前孤立于东方,和她相接触的,都是文化落后的,没有别种进步的文化,可以供她的观摩参证,所以停滞不进。现在假使能够把混乱的敌人去了,以安定作我们的救主,以言论自由养成有力量的舆论,作“安定”的保护者,我相信决不至长处于文化落后生产落后的地位;文化有进步,生产力一天一天的同上,就走到活的路上去。

我们现时,处在死活两条路的分歧上;全民的……命脉全操在领导者的手中;假使各位领导者,有拥护中国民族的诚心,应该认清这个死活的分歧点;一般的社会优秀分子,也应该认清这个死活的分歧点。中国民族的生命,才有永续繁荣的希望,这是今后的去路观。^②

李剑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近代中国之变迁。《磐石杂志》节录其论述,这在当时教会中应算是一种开明的态度。

而《磐石杂志》最重要的有关“公教与爱国”立场的阐述,则是其第2卷第5期的特刊。该刊于1934年5月1日出版。特刊扉页上有马相伯老的题字:“还我河山”,附识曰:“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暴力发动,强占我东北,今年三月又一手演成满洲伪国傀儡一剧,一周年间,山河变色,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③另外,时任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及公教学校视察专员兼辅仁大学伦理学教授的于斌司铎为该刊写了《公教人的爱国精神》的卷首语。该刊所刊登的论文及文献如下:(1)《圣教宗比约十一世于民国十七年对华通电全文》(即八·一通电);(2)于斌:《卷头语——公教人的爱国精神》;(3)陆徵祥:《陆徵祥先生致本

①② 黄伦芳:《〈满蒙问题〉译者叙》,《磐石杂志》第1卷第1期,1931年版,第57-58页。

③ 《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扉页,1934年版。

社函》；(4) 陆徵祥著、金思义译：《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4) 雷鸣远：《实际的》；(5) 牛若望《新经中的爱国观》；(6) 张怀：《公教与爱国》；(7) 多默：《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之壮语》；(8) 赵尔谦：《研究一种爱国的方法》；(9) 许多新：《九五老人马相伯先生的爱国论》；(10) 叶德禄：《雷神父的爱国言论》；(11) 袁承斌：《天主公教的抵抗主义》；(12) 阎有为：《身入修会心在祖国的陆徵祥》；(13) 陈祥春：“若以走为策，则何地不危？”；(14) 张作义：《公教神长给我们的爱国教训》；(15) 陈大径：《沙场中的公教忠勇爱国志士》；(16) 图沫：《救护工作十记》；(17) 叶德禄：《铁窗风味》；(18) 伟文：《中外大事日志》。这18篇论文完全是围绕“公教与爱国”主题展开的讨论^①。

于斌在卷首语中指出：本来公教人的爱国精神就是做模范的教徒，“纯粹切实的公教信徒不能不爱国，因为能爱护祖国，公教生活才有圆满的可能”。然后于斌指出，公教人的积极负责的精神可以落实到三个方面：(一) 对己，“只有操行高尚的人才能去指导民众，只有学识精深的人才可谈生产建设”；(二) 对家庭，“家庭本为国家组成的基本单位，人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已婚的国民，要勇敢地承担家庭的一切义务，站在公教立场对当时流行的自由离婚持反对态度”；(三) 对国家，政府本以造福人民为职志，所以对合法政府不应拆台，反而要赞助，对执政人员的不肖，应用合法的监视督责，促其改善，“我公教信徒对一切国民义务如当兵、纳税、守法、固当凭良心去做，就是公民权利也不许藉口清高，漠然视之。有负责的公民才有优良的政治，注意参加公务，正所以图谋国家的进步。同时对于生于斯，长于斯，食于斯同胞们，也不容漠不关心，一切社会事业，群众运动，只求可以增进同胞幸福，又不背公教教义与道德，就要尽量参加，且应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提倡”，最后于斌指出：

设使国家处于危急地位，如我国目下的内忧外患，国难重重，那么做国民的更应当加倍振奋，枕戈待旦，……。“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若是环境许可，我们就要本着大无畏的精神，向前挺进，为民族的生存，祖国的尊荣，虽流血投命，亦所不辞。^②

没有民族意识的人或能有积极负责的美德，不过对于国家并不感觉特别兴趣，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爱国工作自然表示冷静。……我们公教人深切希望世界和平，极讲国际间的正义人道，尊重别个民族的正当权利，不嫉视别个国家的繁荣向上；同时却也不甘心受强暴的侵略。良心也不许我们对本国利益采取旁观的态度，所以我所谓的民族意识并非过激又不背正理，人人当设法培养。^③

著名的天主教人士陆徵祥在该刊中也有鲜明的爱国言行。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身在比利时修道院中的陆氏没有置身事外。第二年，他用法文写了一本向国际舆论揭露日本炮制满洲伪国、侵害中国的小册子，名为《根据墨西埃枢机的著作以天主教教义看对满洲的侵略和占领》，于巴黎出版。《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刊载了由金思义翻译的中译文，名为《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当时，刊载了陆徵祥在1933年圣诞节写给该杂志编辑部的信。信中说：“……乃沈阳事变爆发，不见哀的美敦书、不闻两国公使下旗回国，而无数敌军、无数战舰、乱入吾境、杀戮吾士民、焚毁吾城郭，神州将见陆沉。所谓空前绝后之远东太平洋大战，几有以此此为导线之势。于世界希望和平最切之时，而帝国主义者竟不畏天命、不悯人言、横施其侵略政策，瞻望前途，感叹无极！”表达了一个中国人在山河破碎时的悲愤。这篇报告列举了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5年强迫中国订立“二十一条”，身历其境的陆徵祥明

① 《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目次。

②③ 《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第2-4、5页。

确指出：“其目的在得到满洲、蒙古、山东、福建，以及扬子江流域等之完全权利与特殊权益；并得干涉中国之内政，特别干涉中国之内政、财政、军事、教育，期获得实际保障中国之保护权。”^①

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悍然出动，占领了比利时的国土。比国马林城（Malines）的枢机主教墨西埃（Cardinal Mercier）不畏强暴，依据天主教的立场和观点，发表了许多布道演说辞，痛责德军暴行，号召人民拒死不承认侵略者统治的合法性，申言公理必将战胜强权的大道，博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陆徵祥认为，墨西埃枢机的言论，极好地阐发了天主教对于不义战争的立场，德国以强凌弱，侵占比利时的情形，也与日本侵略中国相同。所以，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陆徵祥引用了墨西埃枢机的言论，阐述了“公教教义中仁爱与公义之原则完全施用于被敌人无理侵占之国家”。首先，陆氏引用墨西埃的话说，天主教有其当然的爱国观：“公教将爱国观念立法典，凡非纯全爱国者，即非纯全的信友”^②，继而，对于侵略者以爱国为藉口，对他国横施侵略的暴行，予以严辞驳斥：

公教神学曰：否。法律非他，和平而已。即所谓国家之内有秩序，基于公义也。公义只是人与造物主及人与人之根本关系。故为绝对的。是以为战争而战争，乃是罪恶，战争只用作保持和平必需之方法时，可告无罪。圣师奥斯定曰：不为兴战争而求和平，然得为和平而作战。^③

欧战时期，德国在比利时炮制了一个卖国的傀儡政府。墨西埃枢机指认这个政府为伪政府，按天主教的法律不予承认，特发表教书，通谕全体神职人员。陆徵祥认为，中国的天主教会，也应以此种态度对待伪“满洲国”。故将墨西埃的教书引录如下：

此类政府，非合法之政府。故今后汝等心中不须尊敬归附或服从之。在比利时唯一合法之政府，为属吾国王，其统治，为吾国代表之政府。惟此政府，能操吾人之权威，惟此政府有受吾人爱戴与服从之义务。代表强权之占领国的一切行政措施均没有效力，但合法政府为公众利益的举措，人民皆当默准之。^④

按照天主教的教义，人民有权反抗占领者的非法行径，这非但不是一种狭隘的复仇主义，而且是出于仁义的德行：

一国破坏他国之主权，非个人谋害罪。社会处于死刑，可比拟也。……故为公义而报复之精神，为一种美德，仇恨为恶德，二者不可相混淆。仇恨出于破坏，而公义报复起自仁爱。勇毅将恐慌逐出心外，恐慌一旦消除，则正直之人能知其职责之所在；视破坏真理、消灭公义，与侮辱天主，犹侮辱自身然。爱主及爱人之双重心火顿起燃烧，宁可牺牲一切，不愿忍诟受辱，仁爱与热心实为此种行为之动机。^⑤

陆征祥在阐述墨西埃总主教的立场结束以后，加上了他自己所作的一段结论曰：“天主召我入隐修院，我今日亦本公教服务之精神，大声疾呼，重新提出墨枢机已轰动世界的论调。其声音之高大，绝非感情所能骚扰，武力所能摇撼者也。人多窃议：中国系一弱国，其外交势必失败。我人对曰：中国之外交，为理由充足之外交，谁谓公理无最后胜利之一日耶？……中华民族目前虽受新起之不义所摧残。然其复兴，当有绝对之把握。天主正在吾人意志薄弱之中，建立吾人之自信力。吾人之自信力为真理服务，忠于仁义之要求。在此自信力中，奠定和平之基础。In Virtutetetna pax，和平在尔能力之中。”^⑥

多默所作《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的义勇》一文，指出圣·依纳爵罗耀拉就是一位爱国的军人，“他的跛足病，就是他为国牺牲的遗证”。另外，他率士兵驻守西班牙纳瓦尔省邦伯路城，法军围

① 《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第8页。

②③④⑤⑥ 《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第16-24页。

城之时,有人主张投降,但依纳爵向士兵说:“一见敌兵,就俯首请降,太不体面,为国捐躯,比卖国偷生,荣耀多了。”因是依纳爵应视为爱国的模范。牛若望《新经中的爱国观》则指出,耶稣会本人即为一热烈的爱国者,当他看到耶路撒冷城被毁时,痛哭不已,这就是一种强烈的爱国的表现,爱国在《新约》中可以找到它的历史根据;袁承斌的《天主教教的抵抗主义》指出:就私人而言,为一己私人之涵养,在不长人恶的环境之下,公教主张忍辱不较,宽恕仇人,爱仇人,为仇人祈祷;至于团体国家的利益,是团体内每一份的利益,团体内的每一份子都有“竭力保护公共的利益,抗拒敌人的侵害”的责任和义务。“所遇到国家的利权名誉受人侵害时,公教主张抵抗的理由是:为保护国家利益,自然应该抵抗,为正义人道更应抵抗”,“……能抵抗而不抵抗是一种罪恶”^①。陈祥春的《若以走为策,则何地不危?》是一篇借历史典故发挥作者胸怀的好文章,作者回顾了南明的历史,指出桂王朱由榔的“弃城而走”是导致南明灭亡的最大的原因,作者列举的天主教徒,南明忠臣瞿式耜劝告桂王的话,“若以走为策,则何地不危?”但桂王就是充耳不闻,以至最后被吴三桂穷追至缅甸、绞杀于昆明。然后,文章列举了瞿式耜悲壮殉国的感人故事。作者感叹道:“教胞们!我们读了这可歌可泣的瞿式耜殉国记,作何感想?东四省被人侵占了,该地的同胞沦为日人的牛马。教胞们,我们如何去收回失地,拯救日人铁蹄之下的同胞?这是我们的责任,不容旁贷的责任。……历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公教信友,最乐意肩这个重担的。”作者将南明的瞿式耜、焦璉与法国历史上的圣女贞德,波兰的Kosciusko和朝鲜的安重根都视为这重担下的牺牲者^②。张作义的《公教神长们给我们的爱国教训》一文,作者列举了三位公教长者对青年的教训,第一位是教宗庇护十一世,第二位是比利时的墨西埃枢机,第三位是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作者引证了刚恒毅在五卅运动时写给中华公教青年会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爱国及希望国家的利益,不但为人民的义务,也是天主给我们的责任。宗教不但不妨碍爱国,且认爱国是隐含于救世主耶稣痛哭耶路撒冷的遗范,把爱国事情看成神圣的圣情。”^③陈大经的《沙场中的公教忠勇爱国志士》是篇读书报告,作者所读之书为《火线上的神父》(Priests in the firing line),作者盖勒(Rene gaele),伦敦1916年版,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军前线工作的神父们。图沫的《救护工作日记》,作者是一位天主教的学生,他自1934年4月6日至15日参加长城抗战的救护工作,日记描绘的是在唐山后方医院的种种经历^④。

以上便是《磐石杂志》的“公教与爱国”专号的主要内容。从这些文章的收录,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人士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本地化的程度,也可以看到杂志编辑者价值取向以及社会责任感。70余年过去了。“专号”仍然给人以动人心弦的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王恩重)

the National Standing of Special Issue “Public Religion and Patriotic” in *Pan Shi Magazine* 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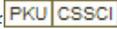
Gu Weimin

Abstract: *Pan Shi Magazine* was one of important publications of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at the beginning of 1930s, it was created by Chinese Public Religion Youth Branch of Beijing Furen University, it aimed at introducing Sino-Western culture and religious survey, and social news. It published a special issue “Public Religion and Patriotic” in Vol.2, 5 in 1934.

Key Words: *Pan Shi Magazine*; Public Religion; Patriotic

①②③④ 《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第44、46-48、51、56-59页。

1934年《磐石杂志》“公教与爱国”专号的民族立场

作者: [顾卫民](#), [Gu Weimin](#)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234](#)
刊名: [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7, ""(2)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7条)

1. [黄伦芳](#) [《满蒙问题》译者叙](#) 1931(01)
2. [查看详情](#) 1934(05)
3. [查看详情](#)
4. [查看详情](#)
5. [查看详情](#)
6. [查看详情](#)
7. [查看详情](#)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kx20070202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775ee09d-e5ea-4fd8-a98b-9e4d007be10b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